

陈第古音研究探索

李恕豪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明代杰出的思想家、语言学家,也是当时保卫我国北方领土的著名将领。所著《毛诗古音考》(1606)、《屈宋古音义》(1614)和《读诗拙言》(附于《毛诗古音考》后),是我国古音学奠基性的著作。陈第彻底破除“叶音”说,提出语音发展的理论,创造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从此,古音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本文主要从陈第的语言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对上古声调的看法三个方面来论述。

语言发展引起的古今音的差异,人们在汉代便有所察觉,然而没有进行研究。魏晋以后,语音同先秦两汉的差异更大了。于是从徐邈、沈重起便产生了所谓“叶音”(或“协韵”)的方法,临时改变某字的读音以求和谐。“叶音”说的缺点,正如钱大昕指出的那样,“以今韵为宗,而强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其实,“叶音”说本身并不是古音研究,只是一种诵读上古韵文使之和谐的权宜办法。以后,陆德明虽然在《经典释文》中提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对“叶音”表示怀疑,但这仍不能解决朗读上古韵文中所谓“不押韵”的问题。相反,“叶音”似乎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叶音”不但未被触动,在朱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更推向了高潮。由于“叶音”说的种种矛盾和漏洞,从宋到明都有人修正这个学说。吴棫作《韵补》,按照其“古通某”、“古转声通某”,可以归纳出九部。郑庠《古音辨》可以归纳出六部^①。但这不是真正的古韵部,它只表示古代韵文中的通转关系,给“叶音”限定了一定范围。杨慎另辟一途,认为古人协韵是从转注来的。陈第指出:“吴才老、杨用修有志复古,著《韵补》、《古音丛目》诸书,庶几卓然其不惑,然察其意,尚依违于叶音可否之间,又未曾会萃秦汉之先,究极上古必然之韵,故其稽援虽博,终未能顿革旧习,而《诗》、《易》、辞赋卒不可读如故也。”(《屈宋古音义·跋》)

也是从宋代开始,一些学者已认识到古音有定。徐霱提出“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②项安世认为“古人呼字,其声音之高下与今不同。”^③戴侗在《六书故》第十六“行”字下说:“《书》、《传》行皆户郎切。《易》与《诗》虽有合韵者,然行未尝有协庚韵者。庚皆去羊切,未尝有协映韵者。如野之上与切,下之后五切,皆古正音,与今异,非合韵也。”^④他们事实上都否认了叶音。明代的焦竑明确地反对“叶音”,说:“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

正呼，凡《诗》亦无正字矣。”（《笔乘》卷三《古诗无叶音》）陈第批驳“叶音”，提出语音发展的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陈第读过《笔乘》，赞同焦氏的观点，1601年开始撰写《毛诗古音考》，1604年还到金陵去同焦竑讨论过这个问题。《毛诗古音考》的最后定稿，也是在焦竑的帮助下完成的。^⑤陈第的父亲陈应奎（字木山）也不相信“叶音”，在陈第的少年时代，他希望陈第今后能否否定“叶音”、研究古音上有所发明。^⑥陈第的论述如下：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母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土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其此何故耶？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毛诗古音考·自序》）

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转递，系乎时者也。（《读诗拙言》）

这样，陈第彻底否定了“叶音”说，建立了语音发展的理论，为古音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库提要》高度肯定了陈氏《毛诗古音考》的巨大功绩和影响，说：“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为首功……。所列四

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微，典必探本，视他家执今韵部分，妄以通韵古音者，相去盖万万矣。”我国古音学的正式建立应自陈第始。

陈第认为语音发展是以渐变的方式进行的。他说：

汉魏六朝之诗，骚赋之变而近体之椎轮也……。其音与古合，如服、它、年、南、嘉、泽、客、发之类，已采入旁证。其与古异者，如车、家、华、邪之类，亦颇附于末，见其所由变者，渐矣。（《读诗拙言》）

在许多字条下，他引用不少材料来考订其始变时间和变化过程。例如：

轨，音九。《说文》从车九声，后转而为几。班固《幽通赋》：“羸取威于伯似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轨。”嵇康《酒会诗》“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醑，微歌发结齿。”张华《游猎篇》以轨与履。美为韵，又转则今之音矣。（《毛诗古音考》卷一）

《毛诗古音考》中，在十六个字条下论证了这一变化过程，即卷一的“华”、“家”、“车”、“轨”、“邪”、“为”，卷二的“瓜”、“存”、“茂”、“葭”、“瑕”，卷三的“寡”、“牙”、“柏”、“遐”，卷四的“妇”。其后，顾炎武继承了陈第的这一思想，在《唐韵正》中旁徵博引，以考证某些字的始变时间和变化过程。其中许多材料和结论都引自《毛诗古音考》。

语音的历史变化在不同的地域导致了方音的差异。陈第对此有一定认识，因而把“时有古今”和“地有南北”放在一起

来谈音的“转移”。顾炎武对陈第的这一思想有重大发展。《唐韵正》卷四“家”字下引用了陈第的话，并用方音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家，古音姑……。陈第曰：

“家，本音姑，汉曹大家读作姑，后转而音歌。《雒朝飞操》：‘我独何命今未有家，时将暮今可奈何？’魏程晓《嘲热客诗》亦以家与过、何为韵。陆机《前缓声歌》以家与歌、波为韵。今乃音加，声之递变也……”。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至幽、蓟之间则又转而各矣。

顾氏在这里暗示了可以把语言在地理上的分歧折合成时间上的差异。由于陈第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毛诗古音考》中收罗了一些方音作为考证古音的旁证。例如卷一有：

乐，音捞，北方至今有此音。

尾，音倚，北方皆倚音，南方皆尾音。

卷二有：

雁，音罗。扬雄《方言》：

“雁谓之罗，罗谓之雁。”

觉，音教。北有此音。

中，音蒸。刘贡父《诗话》云：“关中以中为蒸。”

梅，音迷。楚中至今有此音。

虽然除了“雁”字而外的五字在材料的选择上和结论上都不恰当，但方言作为考证古音的一种旁证，在原则上是可取的。

陈第还注意到语音发展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提出汉语语音的重大变化同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有关。他说：“说者谓自五

胡乱华，驱中原之人入于江左，而河淮南北间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读诗拙言》）这里所说的“声音之变”应该指汉语语音体系的重大变动，而不是个别字音的变化，因为他接着说：“自周至后汉音已转移，其未变者实多。”又说：“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渐尽矣。”（《毛诗古音考·自序》）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陈第正确指出了古音研究的目的在于存古，不在于复古，说：“三百篇，诗之祖，亦韵之祖也。作韵书者宜权舆于此，朔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则今音行而古音庶几不泯矣。”（《读诗拙言》）所以他主张“以今音读今，以古音读古”，说：“用古于今，人之笑也，则用今于古，古人之笑可知。”（《屈宋古音义·跋》）这一主张得到了焦竑的赞成。焦氏说：“为今诗从今韵，以古韵读古诗，所谓各得其所耳。”（《毛诗古音考序》）由于我们对上古音的面貌还未充分了解，仍然得以今读古，但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顾炎武要“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①相比之下，陈第的看法要高明得多。

二

陈第的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其结论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上的。他使用演绎和归纳相结合，而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例如，为证明古诗无叶音，他以《诗》这种“以声教”的文学形式必须和谐这一特点为前提，推导出《诗经》在古代一定押韵，不需要叶音。他说：

夫《诗》以声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长言嗟叹，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将从

容以细绎夫鸟兽草木之名义，斯其所以为《诗》也。若其意深长而于韵不谐，则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毛诗古音考·自序》）

这就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对所研究的事物或现象作出初步解释，提出假说。假说是否正确还须用大量的材料来证实。以《毛诗古音考》第一个字“服”字为例，为证明它古音读“逼”，就有《诗经》“本证”十四条，从周到曹魏的“旁证”十条。材料很广，证据确凿。由此可得到“服”字在《诗经》中是和谐的，不需要“叶音”的结论。进而用同样的方法，对《诗经》中所谓“不押韵”的字一一考察，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最后便可归纳出“古诗无叶音”这一条普遍规律。用排比归纳材料证据的方法来研究学问，是陈第的重大贡献。

陈第的研究方法，为顾炎武所继承。顾氏《音论》中大段引用了陈第的论述，而《唐韵正》中大量罗列材料得出结论的考证方法，与《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同出一辙。只是顾氏材料的范围和数量较陈第更为广博而已。众所周知，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在继承顾炎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陈第开创了以后三百年学术繁荣的先河。张裕钊指出：“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盖加于前时，然陈氏首创之功，顾不伟哉？”（《重刊毛诗古音考序》）容肇祖说陈第“用证据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懂得应用这个方法便是他在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⑤“他的考证学方法，更是开清儒考证学上一条大路。用他的搜求证据的方法来比较当时空虚想象的理学，我

们不能不说是另开一个新时代的先锋了。”^⑥

如何处理和使用材料也是研究方法的问题。陈第首先区分了不同价值的材料。陈第认为，《诗经》是上古音的代表，因而《诗经》的押韵材料是“本证”，其他押韵材料只能是“旁证”。他说：“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毛诗古音考·自序》）这就克服了吴棫《韵补》不区分材料的时代及价值的缺点。这点，为后来的古音学家普遍接受。

如果“本证”和“旁证”“二者俱无”，则应“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同上）其中《说文》的谐声材料最为重要。吴棫早已使用过这类材料，如“皮，蒲波切，肤也。《说文》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韵补》卷二）徐蕙对此作过更为详尽的阐述。陈第进一步论证了谐声在古音研究中的重大意义，揭示了谐声与《诗经》在语音上的密切关系。他说：“泮氏去古未远，当有真见。”（《毛诗古音考》，卷三“禘”字下）“《说文》至明，其可废乎？是废古之音也。”（同上，卷二“慆”字下）“江，音工。《周礼》六书，三曰谐声，江河是也……《说文》以工得声，后世之音去谐声远矣。今集古音，是固不可废也。”（同上，卷四）“《说文》多谐声，虽若近易，而与《诗》叶，后虽巧变，而去《诗》远，《说文》所以不可缺也。”（同上，卷四“填”字下）其后顾炎武更加广泛地使用谐声材料，并进一步用它离析了《广韵》中的支、麻、铎、锡四韵。^⑦江永用谐声离析了虞、先、萧、肴、豪五韵。^⑧段玉裁完成了第一个谐声表《古十七部谐声表》。从此，古韵可审形定声。《说文》谐声材料在使用上的日益重要，陈第是有功劳的。

研究古音除先秦韵文和《说文》谐声外,最重要的是《广韵》。吴棫《韵补》、郑庠《古音辨》都使用《广韵》韵目,但他们只是为了说明《广韵》某些韵部中的字,在上古可以通押而已。只有顾炎武认识到了《广韵》可以作为考证上古韵部的桥梁。这就是江永所说“古韵既无书,不得不借今韵离合以求古音。”(《古韵标准·例言》)这是就整个《广韵》音系来说的,至于《广韵》中的异读,顾氏认为是古今音和方音的差异造成的。②所以大量使用这类材料。其实,陈第已先于顾氏用了这一材料,《毛诗古音考》有这样两条:

逯,音求。《说文》本作
馗,九达道也。沈约亦收尤韵。
黄公绍、吴才老读作求,并证王
粲诗。(《毛诗古音考》卷一)
蛇,音驼。委蛇,行貌。沈
约入歌韵,又入支韵,今亦两读
之。(同上)

这里所说的沈约指《广韵》,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广韵》一系的今音韵书误认为源于沈约的《四声谱》。

三

汉语声调的发现,并定为平上去入四声,是从宋、齐开始的。古音学家看到用后世的四声去读先秦韵文,有不少异调相押的情况,便对上古声调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

吴棫提出“四声互用”。从《韵补》中可以看出,今音不同调的两字在上古韵文中如果能相押,他既把这两字归于某一调,同时也归入另一调。这种情况在去声和入声中最为突出。

程迥提出“三声通用”,大概是指平上去三声可以互押。但程书不传,具体情

况无从得知。

首次论述上古声调的是陈第。他说:

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岂屑屑毫厘,若经生为耶?且去入二音,亦轻重之间耳③。

或问:二平而接以去声可乎?《中原音韵》声多此类,其音节未尝不和畅也④。

四声之辨,古人未有,《中原音韵》此类实多,旧音必以平叶平、仄叶仄也,无亦以今而泥古乎?(《读诗拙言》)

陈第说古人没有“四声之说”和“四声之辨”,并未说上古汉语不存在四声。他的意思是上古诗歌可以异调相押,与后世平必协平、仄必协仄不尽相同而已。陈第认为异调之所以可以押韵,是因为“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曲调可以掩盖字音声调上的差异,这正如为北曲而制的《中原音韵》一样。其后顾炎武对于古诗入乐,齐梁以后文人诗不入乐,因而异调不能相押有详尽的论述:

古之为诗,主乎音者也;江左诸公之为诗,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难移,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

进一步检查陈第的著作,便可以看到他所注的某些字的古音与今音相比,只是声调的不同。《毛诗古音考》有:

怒,上声;贻,去声;上,平声;爽,平声;愿,上声;令,平声;姓,平声;行雉,俱平;寿,上声;圃,去声;故,

平声；喜，去声；定，平声；
政，平声；尽，上声；让，平声；
臭，平声；附，上声；丧，平
声；遁，平声；震，平声；动，
上声。

《屈宋古音义》有：

怒，上声；予，上声；当，
平声；异，平声；上，平声；
志，平声；喜，去声；爽，平
声。

其中“怒”、“上”、“喜”、“爽”四字复见，不能两算，共二十七字。有些字陈第虽注直音，实际上也只是声调的不同。《毛诗古音考》有：

振，音真；居，音倨；事，
音始；顾，音古；道，音鸟；
命，音名；反，音贩；父，音
甫；馆，音贯；畏，音威；士，
音始；素，音苏；正，音征；
户，音虎；予，音与；恻，音
柳；膏，音告；飘，音漂；飧，
音乡；务，音侮；舅，音久；
享，音乡；时，音始；仕，音
始；沼，音召；用，音庸；威，
音畏；树，音暑；视，音始；
反，音番；叟，音搜；依，音
倚；虞，音豫；昭，音照；往，
音汪；茹，音汝。

《屈宋古音义》有：

时，音是；正，音征；巧，
音窍；古，音故；道，音鸟；
顾，音古；如，音茹；镇，音
真；失，音试；居，音倨；举，
音倨；死，音誓；高，为告；
恙，音央；壶，音瓢；众，音
宗；柱，音祖；首，音狩。

其中“时”、“正”、“道”、“顾”、

“居”重复，不能两算，共四十九字。另一些字则注明应读为某字的某声。《毛诗古音考》有：

景，音养上声；好，音休去
声；饱，音浮上声；稼，音姑去
声；出，音吹去声；负，音恃上
声；报，音漉去声，龙，寃平
声。

《屈宋古音义》有：

好，音休去声；乐，音撈去
声。

“好”见重见，只算九字。以上各类字中，“予，上声”与“予，音与”同音，而“时”有“始”、“事”两音，“反”有“番”、“贩”两音，再除去这三字，总共八十二字。这八十二字中，注为平上去三声的字都有。至于入声字，陈第大体上仍用入声字注音。如《毛诗古音考》中“服，音逼；角，音录”等。

由此可见，陈第事实上承认古有四声，只是认为某些字的声调与后世不尽相同而已，同时也承认异调相押。顾炎武批评陈第“全书之中隔阂四声，多为注释，琐碎殊甚。”（《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江永批评“陈氏知四声可不拘矣，他处仍泥一声，何不能固守其说耶？”（《古韵标准·例言》）《四库提要》说《毛诗古音考》“其中如素音为苏之类，不知古无四声，不必又分平仄。”都是没有充分理解陈第的原意。陈第的“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四声之辨古人未有”很明显是指四声的发现，而不是说上古汉语不存在四声。这点，近代学者仍有误解。罗常培说：“陈第《毛诗古音考》倡古无四声之说。顾炎武《音论》更演其旨曰：‘古人之诗，……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故四声可以并用’。”⑩周祖谟虽然正确指

出：“陈氏之意未尝一定认为古音无声调之分，只谓古人为诗平与仄可以通协无碍耳”，但又说：“古无四声说，创自明陈季立。”^⑥还说顾炎武、江永都认为古无四声^⑦。其实，他们三人都未说过古无四声。顾氏“四声一贯”是指古人唱歌时，平声以外的字可以按去上平的顺序临时变调，立论虽不正确，但不等于“古无四声”。至于江永，则明确肯定上古四声的存在，说：“四声虽起于江左，按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古韵标准·例言》）异调相押并不等于古无四声。江有诰认为，“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⑧这与王念孙的看法一致。可见，陈第、江永、江有诰、王念孙对上古声调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陈第给古音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创造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某些领域内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①郑书已不传，据元熊朋来《经说》中“论易、诗、书古韵”这一条可知，郑庠说的是《广韵》中的一韵些部可以相“协”，从而可以归纳出六部来。一般所说的郑氏六部就是这样来的。

②《韵补序》。徐氏这里把语言同文字读音

之间的关系搞颠倒了。形声字的读音不是由声符决定的，相反，采用某一声符则是由语言中词本身的语音决定的。

③《项氏家说》卷四《诗音》。

④此处“合韵”即“叶音”，非后世古音学家所谓邻韵相押的“合韵”。

⑤见《毛诗古音考·跋》。

⑥见《屈宋古音义·跋》。

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⑧、⑨《明代思想史》279页，282页，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年。

⑩顾氏离析了支、麻、庚、尤、屋、沃、觉、药、铎、麦、昔、锡十二韵，但使用谐声材料只离析了这四韵。

⑪见《古韵标准》。

⑫见《音论》卷上《唐宋韵谱异同》及《唐韵正》卷四。

⑬《毛诗古音考》卷一“怒”字下。

⑭同上，卷二“隅”字下。

⑮《汉语音韵学导论》75页，中华书局，1956年。

⑯见《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问学集》上册33页，中华书局，1966年。

⑰同上，35页：“江慎修著古韵标准，固亦用古无四声之说。”36页：“顾氏之论古无四声，疏谬既多。”

⑱《再寄王石隰先生书》，见《唐韵四声正》。

（上接72页）娜拉出走后命运怎样呢？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为她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而金子在《原野》中的最终命运，作家显然是应该给她指出一条具体的正确的道路。因为，在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已经为广大农民的出路和前程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但对党领导的这一伟大革命斗争并没多少了解的剧作家能够写出金子的觉醒和叛逆，能够揭示出造成

金子和仇虎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已是难能可贵了。

（作者为我院中文系八〇级学生）

注释：

①②刘晓庆：《金子和我》，《电影选刊》82年3期，第80、81页。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2页，单行本。

④田本相：《曹禺剧作论》，第149页。

⑤着重号为笔者加。